

清季「天文算學館」 籌設爭議中的保守性思想分析

潘振泰*

清季自強運動的成就有限，其中的因素非啟於一端，本文嘗試以自強運動期間一項重大的新政措施，即同治六年(1867)「天文算學館」的籌設，所引發的爭議為中心，對於這一場爭議中正反兩造的言論進行思想層面的分析，從中探討幾位足以左右自強運動的關鍵人物的思想特質，以說明此一運動發展的局限。本文著重分析兩種保守性思想：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這兩種保守性的思想，就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固然並無新義可言，但是，本文的重點本不在於揭發這些思想的哲學內涵，而是在說明它們如何在當時的爭議中具體地呈現並發生作用。更詳細一點來說，乃在藉由道德理想主義所常使用的兩種論調：德治說、本末說；以及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所常呈現的兩種心態：「中

*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系助理教授。

連絡地址：62103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85號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No.300 Syuefu Rd., Chiayi City 60004, Taiwan (R.O.C.))

法」媲美「西法」論、對西化的疑慮與警戒，來說明這兩種保守性思想如何一方面呈現在反對「天文算學館」籌設的保守派人士的言論中，另一方面卻也反映在推動「天文算學館」籌設的改革派人士的言論中，從而構成他們推動新政的心理障礙，以至自強運動的發展有所局限。

關鍵詞：自強運動、「天文算學館」、道德理想主義、德治說、本末說、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中法」媲美「西法」論、西化的疑慮與警戒、倭仁、張盛藻、楊廷熙、奕訢、李鴻章、曾國藩

一、前言

清季的自強運動是近代中國在面對西力衝擊下，清廷官方所從事的第一次積極的回應，也是中國此後歷時百餘年的現代化運動之開端，這一運動的成就有限。¹這不只關係著有清一代的國祚，也決定了整個中華文化在日後的歲月中又持續不斷地身陷歐風美雨更強烈的侵襲，終至不得不面臨全面自我批判的命運。

自強運動的成就有限，其中的因素非啓於一端，晚近的學者除了從長遠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國政局的變動、文化傳統、經濟狀況與外交政策之外，²也從清季當時的政治結構與政治機運，³以及領導階層的素質良莠來探

¹ 關於自強運動的成敗評價，學者意見不一，例如：李恩涵即認為自強運動是失敗的，參看李恩涵，〈清季同光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比較〉，《思與言》，第5卷第1期（臺北，1967），頁13-23；〈論清季自強運動的失敗與清廷中心領導層的關係〉，收入《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845-872。而張玉法在針對李恩涵第二篇論文所作的評論中則指出，已往的許多研究對於自強運動的領導人物的建樹，以及自強運動本身都有正面的評價，因此對於李恩涵的說法提出質疑。就整個自強運動的整體的成效而言，它的確並未能使清廷因而真正地自立自強，有效地回應西力的衝擊，因此，相較於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說自強運動失敗，亦不為過。但是，若是就此否定此一運動的所有層面，亦未免過當，至少於練兵、製器上，此一運動仍算是有些許的成就。關於自強運動在練兵、製器上的成就，參看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96-221.

²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值得一提的是，Mary C. Wright以「同治中興」為題對於自強運動前後清廷的政治改革所作的廣泛的分析，即是以「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為題，闡明中國在不損及以儒學為主的傳統價值觀與體現這些價值觀的制度為前題，為使中國在近代世界立於不敗之地，所作的政治改革。她在書中即對以儒學為主的「中國保守主義」對於「同治中興」的影響多所著墨，本文對於自強運動期間保守主義思潮的看法雖然與該書相近。然而，該書一則對於保守主義在自強運動期間所展現的言論與思想內涵，較乏解析；再則對於保守主義思潮在改革派人士身上所產生的作用，亦未有說明，如此一來，很容易讓人誤以為，

究其因。⁴本文則嘗試以自強運動期間一次重大的新政措施，即同治六年(1867)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籌設「天文算學館」，所引發的爭議為中心，對於這一場爭議中正反兩造的言論進行思想層面的分析，從中探討幾位足以左右自強運動的關鍵人物所具有的保守性思想，以說明此一運動發展的局限。

本文所稱之為「保守性」、「保守派人士」無價值褒貶之意，純粹為了指涉某些堅持保存傳統價值的思想特質與人物。其實，每一個人都從屬於某種持續性的、既存的社會秩序，「保守」意味著保全一個社會秩序內讓個人感到可靠而親近的事物之願望。當然，屬於每一個人的這種保全願望程度有別，所以，表達強烈保全願望的思想、活動，可以稱之為「保守性」的思想、活動；而保全願望強烈者就可以稱之為「保守派人士」。⁵就此而

保守主義思潮只流行於保守派人士之間，由於他們反對改革，而導致「同治中興」最終的失敗。有別於該書，本文即專注於探討保守性的言論與思想內涵，以及其在改革派人士身上所產生的作用，從而說明導致自強運動最終成果有限的思想性因素，不只是保守派人士基於保守性的思想反對改革，也包括改革派人士自身亦受限於保守性的思想對改革自我設限。

³ 李恩涵，〈清季同光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比較〉，頁12-23。

⁴ 李恩涵，〈論清季自強運動的失敗與清廷中心領導層的關係〉，頁13-23。

⁵ 羅傑·史庫頓(Roger Scruton)著，王皖強譯，《保守主義》(*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18。當然 Mary C. Wright 對於近代中國的保守主義的說明，也很值得參考，她指出歐洲保守主義與中國保守主義雖有懷疑理性與尊重理性等等的不同，但是兩者都有共同之點，就是它們都尊重固有的社會秩序，反對徹底的變革。參看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1-2.此外，Benjamin I. Schwartz 曾有一文從歷史發展與思想內涵進行觀察，以說明一般而言的保守主義與近代中國保守主義的一些特色，雖然該文引證的實例多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保守主義，但其所指出的近代中國保守主義的種種特色，亦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葉的自強運動。簡要而言，Schwartz 強調保守主義是有意識地要保存傳統社會秩序，保守主義者所認知的傳統社會秩序不是僵滯不變的，而是一循序漸進漸進的有機整體，這一經歷漫長歲月而且持續發展中的有機整體，所凝聚的智慧與理性並不是微小的個人所發明的，所以不是任何個人有能力和智慧可以加以整個改變的。參看 Benjamin I. Schwartz, "Notes on conservatism in general and in China in particular," in

言，以下論及的兩種保守性思想(道德理想主義⁶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可說都與清季中國知識份子保全中國社會秩序內讓他們感到可靠而親近的事物之願望密切相關，簡言之，信持道德理想主義是希望保全儒者在道德與政治事務上的領導地位；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則是希望保全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國格。因此，這些保守性思想不只存在於「保守派人士」的心中，也存在於「改革派人士」的心中，只是「保守派人士」的保守性思想較為突出，值得我們先加以適度地分析說明。

論及自強運動期間的保守派人士，理學出身的翰林院大學士倭仁(良峰，?-1871)允為典型，以其當時人的觀感而言，倭仁即被視為反改革派的領導人，例如主導自強新政的恭親王奕訢即曾向同治皇帝奏稱，其籌設的「天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21.後兩種有關保守主義的說明詳略有別，但大致都指出保守主義的基調是堅持保存傳統價值，這與史庫頓的定義大致相同。本文雖然接受這樣的定義，但不採「保守主義」一詞，因為該詞容易被意識形態化，使得「保守」所蘊涵的保守性思想成為「保守派人士」的專利，如此，至少就與本文所觀察到的事實是不符的。

⁶ 「道德理想主義」一詞首見於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與人性論〉，收入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臺北：學生書局，1959)，頁24-38，意謂依據傳統儒家人性本善論的預設，政治上的理想境界可以經由聖賢的道德典型感化世人而實現。該詞自此常為學者延用，例如：杜維明對於《中庸》一書的專題研究亦作同意的延用，參看 Tu Wei-ming,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6), 69；張灝亦延用之，並詳加詮釋如下：「所謂道德理想主義是指人格本位的政治觀的兩方面而言：第一，政治的最終目的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富強康樂，而是以全人類為對象，建立一個道德的秩序、和諧的社會。儒家思想中所謂的『天下一家』『民胞物與』便是反映這種理想。其次道德理想主義是指一個政治秩序的建立必須從個人修身開始，一個善良的社會是建築在善良的個人上面。」參看張灝，〈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收入《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12；亦參看 Chang Hao, "The heritage of the ideal of *ching-shih*," in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2-91.本文對於該詞的用法特指張灝所指的第二義，再予以細部的解析，詳見下文。

文算學館」報考人數不多，是倭仁倡議反對使然。⁷這已突顯了倭仁在反改革陣營中的主導地位。此外，同治也許即受此奏議的影響，在綜觀各種反改革派人士的言論後，針對反改革派人士楊廷熙所提出的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理由時，即明言：

推原其故，總由倭仁自派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後，種種推託所致，楊廷熙此摺如係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體，其心固不可問，即未與聞，而黨援門戶之風，從此而開，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⁸

不論倭仁是否真的授意反改革派人士群起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他的反對意見顯然已廣獲其他反改革派人士的共鳴，所以讓同治皇帝因此憂慮「黨援門戶之風，從此而開」。此外，《清史稿》的作者在為倭仁的傳記下評語時也說：

倭仁晚為兩宮所敬禮，際會中興，輔導沖主，兢兢於君心敬肆之間，當時舉朝嚴憚，風氣賴以維持。惟未達世變，於自強要政，鄙夷不屑言，後轉為異論者所藉口。⁹

這一則說明了他在清廷高層的影響力；二則道出了他的保守派立場；三則印證了他在保守派陣營中的領導性地位。

可見倭仁應可視為左右自強運動成敗的關鍵性人物之一，歷來學者對他的歷史評價極低，例如，梁啟超即直率地斥責他「誤人國家，豈有涯耶！」¹⁰對於「西化」抱持同情立場的殷海光也極度嘲諷倭仁之類的理學

⁷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第62輯，卷48，頁4605。

⁸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97。

⁹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校註，《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1986-91），頁9943。

¹⁰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選舉〉，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30。

家，說他們「都是『唯心的』，他們不屑於務現實瑣事。他們只『內向用心』，終日高談心性。他們的重大任務是『承繼道統』、『維繫聖教』。這種人像呆在蜘蛛網正中心的蜘蛛。他們不到現實世界去採蜜，只維持住蜘蛛網式的『綱常名教』。」¹¹這類的評價都不免涉及評論者個人的情感偏好，未必合乎嚴肅的學術研究之規範。

但是，對於這樣一位人物與自強運動發展的關係，歷來嚴肅的學術研究其實也不多。國外學者大致只整理其生平資料或簡單陳述其反對「天文算學館」籌設的過程，而視他為一極端排外、頑固的保守派人士。¹²晚近華人學者張灝、陸寶千、李細珠等人始以同情地理解的態度，試圖探究倭仁保守性言論所代表的時代性意義，並勾勒出其思想的全貌。張灝乃專注探討倭仁的排外思想的特質，從其思想概況與當時的知識界背景，乃至有關籌設「天文算學館」所引發的爭議之中，發掘出造就其排外思想的四大因素：程朱理學的哲學立場、個人生活圈、從政經驗、當時人的排外情緒；¹³陸寶千則先簡要地釐清有關籌設「天文算學館」所引發的爭議中，恭親王奕訢與倭仁兩造之間的論辯內容，從中整理出倭仁反對的理由，進而藉此回溯其政治思想，以說明倭仁與其理學同儕力圖自強的心聲，並試圖予以適度、合理的評價；¹⁴李細珠則從清季程朱理學發展的脈絡著手，探討道、咸、同時期的理學復興及其原因，進而說明倭仁理學思想從陽明學轉向程朱學的歷程，力圖完整地呈現倭仁的理學思想全貌，以評價他在道咸同理學史的

¹¹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臺北：活泉出版社，1981），頁238。

¹² Arthur W.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861-863;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244.

¹³ Chang Hao, "The anti-foreignist of Wo Jen, 1804-1871," *Papers on China*, 14 (1960), 1-29。

¹⁴ 陸寶千，〈倭仁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臺北，1971），頁257-270。

影響與地位，文末雖然以倭仁與曾國藩的比較，嘗試說明理學與「同治中興」的相關程度，但是，該文關注的焦點畢竟在於倭仁當代理學的，對於倭仁的思想在自強運動期間所發揮的作用著墨較少。¹⁵

總結而言，以上所有的學術研究成果，都未以倭仁及其相關保守派人士反對「天文算學館」籌設的奏議為研究的核心，加以細部地分析，從而釐清這些奏議的思想特色與其在當時可能產生的作用。本文即意圖彌補此一研究上的空缺，專門針對這些奏議的內容進行思想層面的分析，揭示存在於典型的保守派人士言論中的兩種保守性思想：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並說明這兩種思想不惟淋漓盡致地表現於那些保守派人物的言論之中，其實亦顯現於新政的籌畫者恭親王奕訢的奏議之中，甚至實際從事新政實務推動的大臣李鴻章與曾國藩的奏議，也隱含有這類思想的因素。可以說不論是保守派(以倭仁與隨後將論及的張盛藻、楊廷熙為代表)或是改革派(以奕訢、李鴻章、曾國藩為代表，兼及同治皇帝)皆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受到這兩種思想的影響。若稱這兩種思想是一種時代精神(*Zeitgeist*)，應亦不為過。整個自強運動不能讓清廷真正地自立自強，有效地回應西力的衝擊，而終究只能在西方堅船利砲的震懾下，從事器物層次上的西法模仿、¹⁶西洋技藝的追求。¹⁷或許可以從這一種時代精神的瀰漫，看出一些端倪。

二、「天文算學館」的籌設與爭議之起

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興兵北上，清廷慘遭兵臨城下的奇恥大辱，

¹⁵ 李細珠，〈倭仁與道咸同時期的理學〉，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58-90。

¹⁶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7)，頁121。

¹⁷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臺北：南天書局，1987)冊10，頁581-637。

終於引發了內部求變圖強的動力，「自強」成爲一種時代的呼聲，由地方到中央，以練兵、製器爲主的新政於焉展開。

自強新政初期多專注於西方船礮器械的模仿，但是，隨著各種新政的推動經驗累積，改革派的大臣們漸漸領略到，西方的造船製礮之法實在不只是一種單純的製造技藝，背後尚有豐富的學術內涵作爲基礎。¹⁸就當時人的理解所及，這背後足以作爲造船製礮技藝的學術基礎，最主要的亦即當時所謂的「天文、算學」。同治二年(1863)二月，李鴻章在建議於廣州、上海添設同文館的奏疏中即宣稱：

彼西人(指西洋人)所擅長者推算之學、格物之理、製器尚象之法，無不專精務實，泐有成書，經譯者十纔一二。必能盡閱其未譯之書，方可探蹟索隱，由顯而入精微。我中華智巧聰明豈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轉相傳習，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當可由漸通曉，於中國自強之道似有禪助。¹⁹

他大概已經粗略地認識到「推算之學、格物之理、製器尚象之法」三者之間的關連性，亦即了解「一切輪船火器等巧技」背後尚有深奧的學理待人探究。同治三年(1864)四月，他致總理衙門的書函中又言：

查西士製造，參以算學，殫精覃思，日有增變，故能月異而歲不同。中國製砲之書以湯若望《則克錄》及近人丁拱辰《演砲圖說》爲最詳，皆不無浮光掠影、附會臆造之談，而世皆奉爲祕本，無怪求之愈近失之愈遠。²⁰

這是明確地道出，西方器物之所以會日新月異乃是以嚴謹的算學學理爲基礎，歷經長期深入的學術研究而得的。相較之下，中國製砲之水準所以會

¹⁸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定意識形態的西化理論》(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61-64。

¹⁹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14，頁1416。

²⁰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25，頁2490。

遠遜於西方，亦緣於中國人只停留在單純的製作層次，而沒有深入探究製作器物背後的嚴謹的學理使然。

恭親王奕訢亦有與李鴻章類似的認知，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他在奏請開「天文算學館」時亦明言：

因思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車，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現在上海、浙江等處講求輪船各項，若不從根本上用實功夫，即學皮毛，仍無裨於實用。²¹

這亦同樣明確地道出這些西方器物背後尚有學理亟待深入探索，方能確實地習得這些器物的製作知識。他因此建議「添設一館，招取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以外者，……前項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少年聰慧，願入館學習者」²²赴總理衙門考試，「等錄取後，即延聘西人來館授以天文、算學。」²³

由單純的器物仿造邁向西方天文、算學的學習，這時自強新政的發展可以說出現了一次質變的契機，這種質變意謂著清人追求西學的層次可能要從器物的層次超越到學術的層次、甚或文化的層次。可是，對於保守派人士而言，這樣的超越已經超出了他們能夠忍耐的底線了，反對新政的聲浪於是驟然而起。同治六年(1867)正月，山東道御史張盛藻首先發難，奏議主張天文、算學應由工部、欽天監甄選一般工匠學習即可，不宜招「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科甲正途官員入館學習。²⁴張盛藻的奏議並未被同治皇帝採納，同治皇帝並下召宣示天文、算學應為儒者所當知，不得視為奇技淫巧，讀聖賢書與學習西學不可有所偏廢。²⁵皇帝對於新政的支持並未

²¹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6，頁4416。

²²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6，頁4416-4417。

²³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6，頁4417。

²⁴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39-4542。

²⁵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42-4543。

讓反對新政的保守派人士因而退卻，三月間，大學士倭仁亦同聲附和張盛藻的論調，由於倭仁官居要津，望重士林，他的登高一呼，許多高級的官員都捲進了隨後保守派與改革派的爭議之中。²⁶這一場爭議持續到同年的六月三十日，候選直隸知州楊廷熙藉直隸當地自該年年初以來所發生的旱災為由，宣稱天象示警，提出十大理由附和張盛藻與倭仁的意見，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²⁷針對楊廷熙的奏議，同治皇帝再次下召支持總理衙門的籌設「天文算學館」，肯定西學可以與儒學相輔相成。並藉此訓斥倭仁的保守派人士開啓黨援門戶之風，有傷世道人心。²⁸這樣的指責無疑非常嚴峻，保守派人士的反對言論因此受到重挫，至此即告終止，此時大勢大致已算底定，這一場爭議也告一段落。

在這一場爭議中雖然保守派人士與改革派人士對於籌設「天文算學館」一事立場迥異，但是，從這些爭議言論中，吾人卻可發現兩種保守性思想：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彌漫正反兩造。以下就針對這兩種保守性思想詳加說明。

三、保守派人士的保守性思想

首先，就其在保守派人士的言論中所展現的面貌而言，當然，這兩種保守性思想是保守派人士言論的主要論據，一再被他們強調。首先就道德理想主義而言，它表現在以下兩種論調中：

(一)德治說：道德理想主義者認為政治的事務可以等同於道德的事務，因此，國家的事務應以道德性的事務為基礎，例如，張盛藻即宣稱：

²⁶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245.

²⁷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74-4675。

²⁸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96-4697。

若以自強而論，朝廷之強莫如整綱紀、明政刑、嚴賞罰、求賢、養民、練兵、籌餉諸大端。臣民之強，則惟氣節一端耳！朝廷能養民之氣節，是以遇有災患之來，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敵愾，赴湯蹈火而不辭，以之禦災，而災可平，以之禦寇，而寇可滅，皆數百年深仁厚澤，以堯舜孔孟之道為教，有以培養之也。²⁹

他以朝廷、臣民兩部分論國家強盛之道，就前者而言，雖然論及「諸大端」，但明以「整綱紀」這樣富有強烈道德意味的事務為首，已可見其相信德治的心態；就後者而言，他又認為任何變故都可以全賴臣民的氣節加以化解，而臣民的氣節則是靠長期的道德教化養成。接著，他又指出：

若今正途科甲人員習為機巧之事，又藉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輕氣節，無氣節，安望其有事功哉？³⁰

「正途科甲人員」(以下諸多言論提及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員，本文申論時，僅以「正途之士」名之)的道德操守比他視為「機巧之事」的「天文算學」知識更為重要。所以，他主張天文、算學應由工部、欽天監甄選一般工匠學習即可，「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員肄習其事，以養士氣而專責成。」³¹都道出了他心中的德治信念。

其次，我們看倭仁的說法，³²在其首次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奏摺中，他一開頭即明言：

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³³

²⁹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41。

³⁰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41。

³¹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42。

³² 陸寶千研究倭仁的政治思想即簡述其經世思維的優先順序為：強調先致君德、其次學術(學校)、而後人才、最終政治，這與德治說亦若合乎節。參看陸寶千，〈倭仁論〉，頁262。

³³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57。

這可能是德治說最明確的宣示了。既然以禮義、人心為立國的準繩，於是，用人、行政亦必以之為絕對的依據，所以，他即強調：

欲求制勝，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謀自強，必謀之禮義之士。³⁴

而且，維繫這種德治理想於不墜的關鍵，實際上亦在於這群「忠信之人」、「禮義之士」能對於萬民發揮風行草偃的模範作用，觀其在奏摺中，對於當時在基督教盛行的情況下，「天文算學館」又欲招「正途之士」學習西學，所表現的憂慮，即明顯地表露出這種心態，他說：

議和以來，耶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為煽惑，所恃讀書之士講明義理，或可維持人心，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³⁵

在此，他之所以反對朝廷欲招「正途之士」學習西學，乃是因為憂心伴隨學習西學而來的，尚有西方基督教道德倫理的傳播，在他看來，在此之前，西方基督教道德倫理的傳播即已對一般社會大眾造成負面的影響了，如今又要令「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這樣的道德精英學習西學，無異是讓西方基督教的道德倫理的傳播更為加速而徹底，進而導致中國道德淪喪。

最後，我們看楊廷熙的說法，在其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十大理由中，即兩度呈現德治說的言論，一是：

作忠義之氣於行間，盡教養之懷於民上。……敬事而信無所欺。如此則紀綱立，號令行，政教興。洋人雖眾，機器雖利，輪船雖多，斷不敢肆行無忌也。³⁶

³⁴ 寶鑿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59。

³⁵ 寶鑿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58-4559。

³⁶ 寶鑿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3-4684。

這是確信只要在道德事務竭心盡力，就可以綱舉目立，從而令洋人畏服。

一是：

臣觀史冊，見歷代之致昇平臻郅治者，皆上有至誠無息之令主，下有各盡其職之臣工，緯武經文，一時天下畏威懷德，庶民子來，百工咸集，蠻夷率服矣。³⁷

這是尋求過去的歷史經驗來驗證道德事務的重要性，更是典型的德治說的展現。

而且，楊廷熙與倭仁一樣，也對於當時在基督教盛行的情況下，「天文算學館」又欲招「正途之士」學習西學表現出類似的憂慮，他說：

科甲人員讀聖賢書，將以致君澤民為任，移風易俗為能，……習其教(指基督教)者勞不可破，而忠義之氣自此消矣，廉恥之道自此喪矣，機械變詐之行自此起矣。³⁸

這是明白表現出對於「正途之士」這樣的道德精英會因學習西學，從而接受基督教，終至使其個人道德淪喪，最直接的憂慮。不只如此，他又推演道：

蓋科甲官員，四民之瞻仰，天下所崇奉者也。查耶穌之教流入中國有年，……其教乃違天害理滅倫廢義之教也。……今而使少年科甲人員習其天文數學，北面修弟子之儀，不二十年間，循例升轉，內而公卿大臣，外而督撫大吏，皆惟教是從，惟命是聽，出於門牆者也。萬一徇私情，廢公義，其害可勝言哉？又恐天下之人因科甲尚且學習，遂相習成風，或奉行不善，一時顯蒙愚魯之輩、奸宄不法之徒，藉習天文算學為名，結黨成羣，互相引誘煽惑，倚彼勢力造言生事。

這是明確地表示他所憂慮的不只是「正途之士」這樣的道德精英會因學習

³⁷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5。

³⁸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6-4687。

西學、接受基督教而道德淪喪，更重要的是，他們會產生風行草偃的效用，使全中國的人民皆道德淪喪。這番的推演正是德治說最典型的展現。

(二)本末說：³⁹德治說既然認定道德性的事務是國家事務的基礎，依照這一前題推演下去，道德理想主義者即主張國家的事務應以道德為主，技藝為末，例如，張盛藻即宣稱：

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也。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用製造輪船、洋槍之理乎？⁴⁰

他雖然沒有明用「本末」二字，但是，他視「孔孟之書」、「堯舜之道」為本，「製造輪船、洋槍之理」為末的心態，其實已經昭然若揭。因此，他認為，即使有設立技藝性的專館之必要，也應該慎選人才入館學習。他主張：

止宜責成欽天監衙門，考取年少穎悟之天文生、算學生送館學習，裨西法與中法互相考驗，至輪船、洋槍，則宜工部遴選精巧工匠，或軍營武弁之有心計者，令其演習，傳授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員肄習其事，以養士氣而專責成。⁴¹

於此，他即明白地展現了技藝性事務與道德性事務應嚴加區別、專人分職的觀念，隱約中亦透露學習技藝性事務乃是下等人之事的心態。而在德治說的前題之下，他認為，負有教化萬民責任的「正途之士」就不宜學習技藝性事務，只應專心涵養其士氣。以德性為本、技藝為末的心態，更是不言而喻。

³⁹ 本末說在傳統的儒學脈絡中應追溯自《大學》，《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熹，《四書集注》(臺北：學海書局，1982)，《大學》，頁1。)歷代的儒家學者儘管對於《大學》的詮釋紛議不斷，但是，他們卻一致同意《大學》所說內外、本末、終始當嚴加分別的主張。參看 Wing-tsit Chan, "Moral and social programs: the *Great Learning*," in Wing-tsit Chan, comp.,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85.

⁴⁰ 寶鑒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40。

⁴¹ 寶鑒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41-4542。

其次，我們看倭仁的看法，他雖然承認天文、算學為六藝之一(即屬「數」一藝)，為儒者所當知。⁴²但是，他又指出：

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處久之者。立國之道，……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求之一藝之末，……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⁴³

這不啻是義正詞嚴宣示人心為本、技藝為末是永恆不變的法則。在這一前題下，朝廷圖強變法主要所應作的，當然不是追求術數技藝，而是教化人心。

最後，我們看楊廷熙的說法，在其申論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十大理由的前言中，他即明言：

修德行政，實千古臨御之經，盡人合天，乃百代盛強之本，自來奇技淫巧，衰世所為，雜霸驩虞，聖明無補。……孔子不言天道，孟子不重天時，非故秘也。誠以天文數學，機祥所寓。學之精者，禍福之見太明，思自全而不為世用，事事委諸氣數，而或息其忠孝節義之心；學之不精，則逆理違天，道聽途說，必開天下奇衰誑惑之端，為世道人心風俗之害。伊古以來，聖神賢哲，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數而言理，其用意至深遠矣。⁴⁴

這是將本末說推展到極端，「天文數學」不只被視為末務，甚至是祥瑞災異之奇技淫巧。所以，他隨後即強調「此時當務之為急者，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數機巧而在政治修明。」⁴⁵

就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而言，這意謂著，在面對近代西方學術與文化時，保守派人士通常保有以下兩種心態：

⁴²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57-4558。

⁴³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57-4558。

⁴⁴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75-4676。

⁴⁵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3。

(一)「中法」媲美「西法」論：廣泛而言，即相信中國的學術與文化足以媲美西方的學術與文化的心態。⁴⁶在這種心態主導下，保守派人士認為，當務之急，便是要在中國的學術與文化中搜尋「天文、算學」的成就，以與西方的「天文、算學」的成就相抗衡。例如，張盛藻即宣稱：

我朝頒行憲書，一遵御製《數理精蘊》，不爽毫釐，可謂超軼前古矣！
即或參用洋人算術，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耳。⁴⁷

從「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一說即可證明，在他的心目中，中國的「天文、算學」足以與近代西方的「天文、算學」的成就媲美。

這樣的心態也反映在倭仁的奏摺中，例如：

蓋以理度之，天文、算學，世有專家，不必奉夷人為師。算法係六藝之一，如欲講求，中國豈無精是術者。⁴⁸

細繹之，在此，倭仁所引以為據的「理」實在沒有什麼客觀的必然性可言，即使勉強把「算法」等同於「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數」，視作一種自古以來儒者即已習於研習的知識，因而把這當作一個歷久不變的「理」，但是，這一種等同於「數」的「算法」所含蓋的知識內容是否能與西方的「天文算學」相比擬，恐怕難以得到確定的保證。總結而言，倭仁在此雖然未明言「中法」足以媲美「西法」，但是，他之所以以個人自認為是的「理」推斷「天文、算學，世有專家」，恐怕是他一廂情願地選擇相信「中法」足以媲美「西法」的心態的一種曲折的表現而已。類

⁴⁶ 就此而言，這種「中法」媲美「西法」論頗凸顯了 Benjamin I. Schwartz 所指出的近代中國保守主義的一項特色，即是：它主要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 (cultural conservatism)，基本上並非直涉社會政治現狀的社政保守主義 (sociopolitical conservatism)。參看 Benjamin I. Schwartz, "Notes on conservatism in general and in China in particular," 16-17.

⁴⁷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39-4540。

⁴⁸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615。

似的說法也用以下這樣的方式表達：

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⁴⁹

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自我安慰心態，亦即，不明言「中法」足以媲美「西法」，而以強調中國之大，自有人才，強化自信，從而隱約地暗示「中法」可以媲美「西法」，不必「師事夷人」。

楊廷熙也一樣明白地展露類似的心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引經據典地說：

中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曩哲，或仰觀俯察，開天明道，或繼承續傳述，際天立極，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極之道，旁通四達。體之為天人性命參贊化育之經，用之為弟典王謨聖功賢學之準，廣大悉備，幽明可通，所以歷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為精；言數學者，中國為最；言方技藝術者，中國為備。……恐西學輪船機器未必如此幽深微妙。⁵⁰

依他之見，「中法」不只足以媲美「西法」，甚至更勝過「西法」，此外，與倭仁一樣，他也強調：「以中國之大，養士之久，豈無一二知天文明數學之士，足以駕西人而上之者哉？」⁵¹以強化「中法」足以媲美「西法」的信心。

(二)對西化的疑慮與警戒：就鞏固中國的學術與文化在中國人心理上的優越地位而言，「中法」媲美「西法」論猶如在保守派人士的心中建立一座心靈城堡，而對於西化保有疑慮與警戒的心態，則有如在這一座城堡四周挖出一道護城河，以防範西方學術與文化的污染，以保持中國自己的學術與文化的純粹無雜質。⁵²此外，此心態與中國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鴉片戰爭

⁴⁹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58。

⁵⁰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79-4680。

⁵¹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0。

⁵² 這樣的心態的流行亦合乎 Benjamin I. Schwartz所指出的近代中國保守主義的另一

戰敗以來飽受英法等國軍事侵略，而激起的排外情緒有關，倭仁等保守派人士即為這種情緒最典型的代言人。⁵³

這種心態針對當時中西敵對的現狀所產生的最直接的反應，即是對於西洋人是否真有傳授「西法」的誠意表示懷疑，例如，倭仁即明言：「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⁵⁴西洋人是否「詭譎」，難有定論，倭仁的論斷或可視為任何敵對的兩造對於對方難免的疑懼。不過，除此之外，對於西洋人「未必傳其精巧」，他也提出一種現實的理由，他說：

夷人機心最重，狡詐多端，今欲習其秘術以制彼死命，彼縱陽為指授，安知不另有詭謀？⁵⁵

敵對的兩造必然是處心積慮以求克敵制勝，若對方有意傳授其制勝之術，另一方的確不免要有警戒之心。就此而言，撇開他對於西洋人的「機心」之論斷不說，倭仁可以說是基於務實的理由，對於學習「西法」表達自然的警戒之心。不過，除此之外，他會反對學習「西法」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理由，亦即，學習「西法」會對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產生衝擊。

他針對以「正途之士」學習「西法」的提議時，首先乃延引清聖祖康熙的先例提出如下的警告說：

伏讀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諭大學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仰見聖慮深遠，雖用其法，實惡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復揚其波，而張其焰耶？⁵⁶

此處將「西法」與「西人」分開而論，實在意義重大，一方面透露了他對

項特色，即是：它的民族主義的成份具有主導性地位。參看 Benjamin I. Schwartz, "Notes on conservatism in general and in China in particular," 16.

⁵³ Chang Hao, "The anti-foreignist of Wo Jen, 1804-1871," 23-25.

⁵⁴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57-4558。

⁵⁵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99。

⁵⁶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59。

於「西人」對於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戒心，一方面，他認為「西法」或許可學，但是，隨著「西法」的學習卻讓「西人」氣勢日益高漲，相形之下，便使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下降。

學習「西法」已足以讓「西人」氣勢日益高漲了，又要「正途之士」學習「西法」，讓他們以洋人為師，這在倭仁看來，危險更大，他感慨道：

今以誦習詩書者而奉夷為師，其志行已可概見，無論所學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盡力報國乎？恐不為夷人用者鮮矣！⁵⁷

其實，此處之外，一如前引文所見，倭仁已經一再地強調「不必奉夷人為師」、「何必師事夷人」其中代表的意義，一則，一如張灝所指出的，基於中國傳統倫理，「師」乃與「天」、「地」、「君」、「親」並列「五倫」之中，地位崇高，以夷人為師，將「嚴重地威脅到傳統中國學者強烈的文化優越感」；⁵⁸二則，也許是更重要的一點，依據上引倭仁的感慨之辭來看，他更擔心其實是，「奉夷為師」將使「正途之士」難以「存心正大、盡力報國」，喪失對於中國的國族忠誠，如此，即便他們學習「西法」有成，不但不能造福中國，反而可能為害中國。

楊廷熙對於西化的疑慮與警戒的心態在其奏摺中亦處處可見，稍有別於倭仁的是，他首先即強調洋人自道光以來對於中國的侵略，這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的奇恥大辱，不共戴天之讎。⁵⁹以這種強烈的仇恨意識為出發點，他對於西化的疑慮與警戒也比倭仁更明顯。例如，提及讓「正途之士」學習「西法」時，他即指出：

一旦使之師事讎敵，竊恐朝夕相聚，西人或懷私挾詐，施以蠱毒，飲以迷藥，遂終身依附於彼，昏瞶不醒。⁶⁰

⁵⁷ 寶鑒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99。

⁵⁸ Chang Hao, "The anti-foreignist of Wo Jen, 1804-1871," 14。

⁵⁹ 寶鑒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77-4678。

⁶⁰ 寶鑒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6-4687。

對於洋人的不信任可以說達到極端。再言及師法洋人製造船礮，並學習防禦破解之道時，他更強調：

夫洋人詭譎百出，所為狡焉思逞，侵陵中國者，方將以輪船機器罔中國無窮之利，斷不能以精微奧妙指示於人。⁶¹

這是從洋人狡詐的個性推論師法洋人製造船礮是不可行的。因此，與倭仁一樣，他也一再強調「自卑尊人，舍中國而師夷狄」的不當；⁶²認為不該讓「正途之士」師事讎敵的主要理由是「華夷之辨，不得不嚴；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⁶³指出「正途之士」「北面修弟子之禮，不二十年間，循例升轉，內而公卿大臣，外而督撫大吏，皆惟教是從，惟命是聽，出於門牆者也。」⁶⁴同樣不只憂慮文化優越感遭到威脅，也擔心民族自信心的流喪以及「正途之士」對於中國的國族忠誠不再，這都足以彰顯他對於西化的疑慮與警戒的心態。

四、改革派人士的保守性思想

一如前述，倭仁等保守派人士與恭親王奕訢的這一場爭議最後的結果是，「天文算學館」終究還是獲准成立，這似乎可以算是改革派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是，從稍後的發展來看，改革派的勝利只是一時的，其勝利的戰果並未持續太久，實際上，保守性思潮卻左右了當時甚至日後的政治走向。例如同治皇帝在回應楊廷熙所提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奏摺時，即強調：

直隸知州楊廷熙奏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一摺，嘵嘵數千言，甚屬荒

⁶¹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8。

⁶²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1。

⁶³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86。

⁶⁴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90。

謬。同文館之設，歷有年所，本年增習天文算學，以裨實用，歷經御史張盛藻、大學士倭仁先後請罷前議，因其見識拘迂，疊經明白宣示，茲據該知州所陳十條，不過摭拾陳言，希圖自炫，原可置之不論，惟有關風俗人心者甚大，不得不再行明示。⁶⁵

這一論旨顯露了同治對於倭仁等「保守派人士」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之諸多奏議的不耐，即便他認定這些奏議「見識拘迂」，但還是擔心它們「有關風俗人心者甚大」。這已足以說明「保守派人士」的保守性見解對於朝廷從事改革所構成的強大壓力。

此外，以「天文算學館」一成立投考人數不多的現象而言，也可說是保守派人士的言論所產生的立即性的影響。奕訢即曾在其奏疏中承認：

自倭仁倡議以來，京師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甚且以無稽謠言煽惑人心，臣衙門(指「天文算學館」)遂無復投考者。⁶⁶

這是奕訢主觀的觀察與論斷，而現代學者的研究實際也證實了他的說法，例如，張灝即指出，因為倭仁望重士林，「他對於『同文館』內設『天文算學館』激烈的反對態度，亦引來一般人對『同文館』強烈地厭惡，普遍地認為士大夫應以入該館為恥。這般周遭謗議紛擾下，『同文館』實難以發揮它應有的功能。」⁶⁷而「天文、算學館」最後實際的招生情況是：「在滿漢共計 70 位報名者，當中大部份是失業的中年人，『對於這一些落魄潦倒的人來說，總署提供的津貼要比他們的聲譽來的珍貴一些。』結果錄取了 30 人，但最後畢業的只有 5 人。」⁶⁸保守派人士的言論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般。

然而，整個自強運動發展的局限，是否就只是因為保守派人士的反對所致？其實又不然。保守派人士基於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

⁶⁵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9，頁4696。

⁶⁶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605。

⁶⁷ Chang Hao, "The anti-foreignist of Wo Jen, 1804-1871," 14。

⁶⁸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冊10，頁624。

兩種保守性思想，正面地反對新政，固然發揮了阻擾自強運動發展的效果。但是，改革派人士本身其實心中亦懷有這類保守性的思想，事先為他們自己的改革事業自我設限，這實際上也是導致自強運動發展的步調遲緩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就這一場爭議的主角，亦即自強運動在中央的主要籌畫者恭親王奕訢而言，他對於籌設「天文算學館」所可能遭遇的非議，其實早已有所提防，所以，早在倭仁等保守派人士提出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奏議之前，他即於同治五年十二月的奏摺中事先辯解道：

此次招考天文、算學之議並非矜奇好異，震於西人術數之學也。⁶⁹

這是言明增設「天文算學館」實是情非得已，乃是基於現實之需要。雖然他已隱約地承認了西方的「天文、算學」具有優越性，但是，對於可能招致學習西方的「天文、算學」是捨棄「中法」而屈從「西法」的非議，他接著也預先強調：

查西術之借根，實本於中術之天元，彼西土目為東來法。特其人性情縝密，善於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學如此，其餘無不如此，中國創法，西人襲之。⁷⁰

在此，他即明確地引出「西學源於中國」說為自己辯護，「西學源於中國」說可以算是「中法」媲美「西法」論的變種，此說雖然可能可以在情緒上稍稍平息承認「西法」優於「中法」會讓當時的中國人感受到的焦慮與忌恨，有助於較順利地接納西學。但是，此說畢竟是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的產物，它的存在不免有礙時人認真地分辨中學與西學的內涵有何差異。

對於另一種可能反對增設「天文算學館」的理由，即技藝之學是末務的質難，在同一份奏摺中，奕訢也預作回應之說道：

⁶⁹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6，頁4497。

⁷⁰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6，頁4499。

或謂製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為之，臣等尤有說焉，查《周禮》〈考工〉一記所載皆梓匠輪輿之事，數千百年，鬻序奉為經術，其故何在？蓋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也。⁷¹

此說一方面能清楚地揭示西學本有器物層次(即上文所謂的「藝事」)與理論層次之分，另一方面又設法延引傳統儒學的要務「格物致知」，以牽合學習西方科技的學理一事，實在頗富新意，可能也有助於中國的士人平心靜氣地接受西學。但是，如此明確地區分匠人、儒者之事，「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期許各職所司，不使儒者「親執藝事」的想法，恐怕亦是前述「德治說」與「本末說」影響下的士民分途觀念的衍生物。在這樣的心態主導下，進入「天文算學館」學習西學的學者就難免會流於只重學習學理，輕視藝事，而不能融通西學的器物層次與理論層次。

除此之外，同治六年正月，同樣也是早在保守派人士提出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奏議之前，他提議派徐繼畲任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的奏議，也顯示他致力排除當時中國士人對於「師事夷人」的疑慮，他奏稱：

現在學習天文、算學之員，均係已成之材，漢文無不通曉，漢教習自可不設。但亦必須有羣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開導，庶學者有所稟承，否則該館止有洋人講貫，而中國無師表之人，恐學者竟疑專以洋人為師，俾修弟子之禮，未免因此裹足。⁷²

此奏議所提及，必須有「羣情宗仰之一人」、「師表之人」在「天文算學館」指引開導，學者，同樣表現出一種認為道德性事務應凌駕於其他事務的德治心態，亦即認為學習西方的「天文、算學」固然是一時應變必要之舉，但是仍然需要有一道德崇高的領導者從旁指導，以免學者在道德教育的層

⁷¹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6，頁4501。

⁷²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24。

面上失去遵循的準繩，而有心存師事洋人的危險。在這樣的心態主導下，進入「天文算學館」學習西學的學者恐怕也難以按照傳統尊師重道的規範向西人教師虛心求教。

最後，我們再看弈訢於同治六年三月正式回應倭仁反對籌設「天文算學館」的奏摺，類似的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亦一一展現其中，弈訢一開始即強調：

自古禦夷無上策，大要修明禮義，以作忠義之氣為根本，一面即當實力講求戰守，期得制伏之法。⁷³

所謂「禦夷」需「修明禮義」，即在聲明自己並不違逆「德治說」的立場，但是，基於現實的需要，還是得講求戰守制敵的方法。就是在這一大前題之下，他才開始申明必須開館學習西方的「天文、算學」、以及讓「正途之士」入館學習的理由。

首先，他參照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英桂、郭嵩燾、蔣益澧等悉心洋務的大臣們的經驗，⁷⁴而總結道：

(上列諸大臣)僉謂製造巧法，必由算學入手，其議論皆精鑿有據。左宗棠先行倡首，在閩省設立藝局、船廠，奏交前江西撫臣沈葆楨督辦，臣等詳加體察，此舉實屬有益，因而奏請開設「天文算學館」，以為製造輪船各機器張本，並非空講孤虛，侈談術數，為此不急之務。⁷⁵

這些悉心洋務的大臣們的議論與實務經驗，便構成必須開館學習「天文、算學」的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雖然有這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作後盾，但是弈訢不忘強調「並非空講孤虛，侈談術數，為此不急之務」，不免又讓我們懷疑他心中還是深受「本末說」的困擾。

⁷³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79。

⁷⁴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80。

⁷⁵ 寶璽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80-4581。

其次，有關必須召錄「正途之士」入館學習的理由，他解釋道：

又恐學習之人不加揀責，或為洋人所誘，誤入歧途，有如倭仁所慮者，故議定考試必須正途人員，誠以讀書明理之士，存心正大，而今日之局，又學士大夫所痛心，疾者必能臥薪嘗膽，共深刻勵，以求自強實際。⁷⁶

簡而言之，他也顧及了倭仁有關「正途之士」入館學習的憂慮，只是有別於倭仁，他反到認為，由於「正途之士」是「讀書明理之士，存心正大」，所以可以避免「為洋人所誘，誤入歧途」。這一番說法與倭仁的看法不同，但是他對「德治說」的信持，實與倭仁無異。

至於「師事夷人」一事，奕訢則明確地表示：「雇覓洋人，不過與之講究其法，並奏明不修弟子之禮。」⁷⁷這可以算是一種權變的理由，以迴避讓「正途之士」「師事夷人」的指責，但也隱約透露他心中其實也保有對於西化的疑慮與警戒的心態。

以上這些言論出自身為改革派領袖的恭親王奕訢之口，可能具備以下兩種時代意義：其一，若奕訢的言論只是單純為回應保守派人士對其發動的改革之疑慮，這已道出保守派人士所具有的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已構成足夠強大的時代壓力，讓他不得不作一時的權變之論，以安撫人心；其二，若奕訢的言論純是出乎自己的信念，則意謂著他本人其實也心懷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不論何者為真，以上二者對於自強新政的推動都不免構成一種心理的障礙。

除了恭親王奕訢在中央籌畫之外，自強新政的展開大多是源於地方大臣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在目睹西方船堅礮利之後，萌生仿倣之志，在地方上致力練兵、製器，再逐漸由地方到中央推展開來。而整個自

⁷⁶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581。

⁷⁷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8，頁4604。

強運動所獲致的成就，亦多是在地方大臣的推動下完成的。⁷⁸但是這些成就大致亦僅限於練兵、製器的層次，其間的因素，其實亦可從思想上找到一些線索。

在這些地方大臣中，李鴻章的影響力尤其凌駕於其他人之上。而且，同治九年(1870)他就任北洋大臣以後，即成為自強運動的實際領導者。⁷⁹李鴻章對於時局的變化有深刻而切身的感受，他強調當時的中國乃面臨「三千餘年一大變局」。⁸⁰而他對於自強新政的期望亦並不僅限於器物層次上的模仿，從前引同治二年(1863)他建議在廣州、上海添設同文館的奏疏，以及同治三年(1864)四月他致總理衙門的書函，都可見一般。

然而，整體而言，李鴻章雖然面對西方衝擊的回應，可以說是個務實主義者，但是，他一樣保有某種傳統儒者的矜持。⁸¹即使像他這樣傾心改革的人，亦不免不時自覺或不自覺地表達出一些保守性的思想，例如，在同治三年四月致總理衙門的書函中，他力陳練兵、製器之亟需，痛斥中國文士、武夫之鄙陋，但是，他卻又強調：「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⁸²即顯見上述那種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對他的糾纏，使他在強調追求西學的心思之外，不能不為中學的優越性留一餘地。

又如，同治四年(1865)八月，他在議請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的奏議中，亦言：

中國文物制度迥異外洋獠犷之俗，所以致治保邦固丕基於勿壞者，固

⁷⁸ Mary C.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pp. 73-77.

⁷⁹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冊10，頁599。

⁸⁰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卷19，〈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摺〉，頁45。

⁸¹ Kwang-ching Liu, "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 Li Hung-chang's formative years, 1823-186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1970), 5-45.

⁸²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25，頁2491。

自有在。必謂轉危為安、轉弱為強之道全由於仿習機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見。顧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標，非謂培補修養之方即在如是也。⁸³

他以中國「文物制度」與西洋「獠狃之俗」相對照，即已充分地展現出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此外，他既明白地指出「仿習機器」雖是不得不行之舉，畢竟只是「治標」之法，又確信「經國之略，有全體、有偏端；有本、有末」，這即意謂，於此「治標」之法之外，應另有「治本」之道。這「治本」之道，雖然他在此沒有明言，但是，若據下引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十九日，他的〈幼童出洋肄業事宜摺〉的內容，加以推敲，應不外是禮義、人心等道德性的事務。在這一份摺子裏，他即規定留學生：

將來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聖訓、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致囿於異學。……每年八月頒發時憲書，由江海關道轉交稅務司遞至洋局，恭逢三大節以及朔、望等日，由駐洋之員率同在事各員以及諸幼童望闕行禮，俾嫻儀節而昭誠敬。⁸⁴

他積極地要求中國留學生講習傳統的「尊君親上之義」、嫻熟「儀節」，以免「囿於異學」，可見他對於西洋文化對中國留學生的影響是深具戒心的。就此而言，若說李鴻章的改革言論仍難逃前述「德治說」與「本末說」的藩籬，應亦不為過。而上述這些規定，對於那些奉派赴外求學的中國留學生，無疑就構成某種程度的心理障礙，使他們對於西學的汲取有所偏廢，亦不免自我設限，無法有效地理解西洋文化的全貌。

另一位地方大員曾國藩雖然亦熱衷自強新政，但是，以他深受理學陶

⁸³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摺〉，頁35。

⁸⁴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幼童出洋肄業事宜摺〉，頁9。

治的學術背景，以及他與倭仁亦師亦友的關係。⁸⁵除了不免心存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之外，對於有關學習西法的相關事務的推動上，也不可能完全免於受到倭仁等理學同儕的影響。大致而言，早在咸豐十年(1860)他擔任兩江總督時，俄國主動向中國提議願派遣水師會勦太平天國時，即已提出「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⁸⁶的開明見解，而且，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八月，他更樂觀地指出：「今日和議既成，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既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髮逆，可以勤遠略。」⁸⁷雖然他一再強調「購買外洋船，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⁸⁸但是又在關於借洋助剿一事，表示「彼以助我而來，我若猜忌太深，則無以導迎善氣，若推誠相與，又恐包藏禍心。」⁸⁹可見他對於西洋人仍抱持不信任的態度。

這樣的態度當然亦促使他對於西化保有疑慮與警戒的心態，例如在選派留美學生時，據載，倭仁反對派留學生出洋，「曾國藩送學生留美，倭仁復阻之，然不送諸生貢舉，亦卒如其議。」⁹⁰這已說明曾國藩即使站穩了改

⁸⁵ 參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校註，《清史稿校註》，頁9940；李細珠，〈倭仁與道咸同時期的理學〉，頁81-90；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22-39。李細珠與史革新都將倭仁與曾國藩的理學立場細分為修身派與經世派或主敬派與經世派之別，這樣的區分只是對其個別的事功而言，如同史革新所言就宇宙觀、道德論、認識論等方面的觀點而言，兩派是所差無幾的，參看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頁35-36。

⁸⁶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12，〈覆陳洋人助勦及採米運津摺〉，頁2025。

⁸⁷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覆陳購買外洋船礮摺〉，頁2263。

⁸⁸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覆陳購買外洋船礮摺〉，頁2262。

⁸⁹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6，〈議覆調印度兵助剿摺〉，頁2659-2660。

⁹⁰ 李時焯，《中州先哲傳》，卷7，〈倭仁傳〉，頁23，轉引自李細珠，〈倭仁與道咸同時期的理學〉，頁89。

革派的立場，堅持派留學生出洋，但是，在選派的人選上，依然不得不對保守派人士有所妥協，即不啻認同了保守派人士反對朝廷招「正途之士」學習西學的看法，可見曾國藩不免亦保有前述的「德治」心態。而最終他所建議選派的留美學生是「幼童年十三四歲至二十歲為止，曾經讀中國書數年，……稍通中國文理者。」⁹¹可見他除了對保守派人士有所妥協而謹守不招「正途之士」學習西學的原則之外，他本人也希冀留美學生先備有基本的中國文化意識，以免遭到「西化」的危險，這充分說明了他對於西化保有的疑慮與警戒的心態。

附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保守性思想除了潛伏在恭親王奕訢、李鴻章、曾國藩等自強運動的實務推動者身上之外，也表現在形式上的決策者同治皇帝的諭旨中，在同治六年正月，回應山東道御史張盛藻反對招科甲正途官員入館學習天文、算學的奏摺時，同治即諭示曰：

張盛藻奏，科甲正途讀書學道，何必令其習為機巧，於士習人心大有關繫等語。朝廷設立同文館，取用正途學習，原以天文、算學為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為機巧，正途人員，用心較精，則學習自易，亦於讀書學道無所偏廢，是以派令徐繼畬總管其事以責成，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礙於人心士習耶？⁹²

這一諭旨透露的主要訊息大致有二：一則是同治顯然也認同「正途之士」的責任在「讀書學道」，他也同意若「正途之士」「習為機巧」會影響「士習人心」，這足以說明他的心中時時保有「德治說」的想法，所以才會依奕訢之議以徐繼畬這樣一位非天文、算學專業的「羣情宗仰之一人」、「師表之人」「在彼指引開導」，⁹³來「總管其事以責成」，明顯地重視道德事務的優

⁹¹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摺〉，頁4923。

⁹²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42-4543。

⁹³ 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24。

位性；二則是他明言「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亦正面地呼應了張盛藻的說法，⁹⁴展現對於「中法」媲美「西法」論最強烈的信心。

五、結論

從同治六年這一場有關「天文算學館」設立的爭議中，我們看到上述兩種保守性思想：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瀰漫於當時中國政治上的領導階層。對於保守派人士而言，道德理想主義與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正是他們反改革的堅強理據；對於改革派人士而言，兩種保守性思想則是左右他們倡行改革的羈絆；而對於實際掌握政治最後決定權的當權者，亦即慈禧太后而言，在面對一連串的戰敗屈辱所激發的求變圖強的聲浪中，她依然可以巧妙地利用這一股保守主義思潮，適切地在保守派人士與改革派人士的政爭風潮中，保持自己的權位不墜。⁹⁵因此，我們檢討整個自強運動發展的局限，對於政治領導階層的分析，就不能僅限於各個領導人物的心術與能力上，⁹⁶而必須顧及上述兩種保守性的思想在各個領導人物身上所產生的作用。

簡而言之，就道德理想主義而言，「德治說」簡化了繁複的政治歷程與因果關係，使政治完成歸屬於道德的範疇之下，在這一種信念主導下，自強運動期間的政治領導階層無法全面性地接納西學，而僅能將西學的追求當作治標之法；而「本末說」則嚴格地標明了精神面與物質面的區別，將器物之學視為末流之藝，在這一種信念主導下，這些政治領導階層無法正

⁹⁴ 張盛藻的奏摺中即明有「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一語，參看寶鋆等修，《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4539-4540。

⁹⁵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張玉法主譯，《劍橋中國史》冊10，頁625。

⁹⁶ 例如李恩涵，〈論清季自強運動的失敗與清廷中心領導層的關係〉一文，即多從人物的心術與能力來論清廷中心領導階層的素質不良與自強運動失敗的關連。

視器物之學背後的學理依據，乃至其文化根源。

就文化上的民族優越感而言，信持「中法」媲美「西法」論，使得自強運動期間的政治領導階層在倡行學習「西法」的過程中，無法洞悉「中法」與「西法」的內涵有何差異，而流於過度的自信，難以虛心地面對「西法」；而對於西化的疑慮與警戒的心態，則使得這些政治領導階層無法平心靜氣地對待西學，將西學局限於器物的層次，難以了解西學的全貌。

參考書目

Bibliography

(一) 中文

1. 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Shi, Gexin. *Wan Qing li xue yan jiu*,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07.
2. 史庫頓，羅傑著，王皖強譯，《保守主義》，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Scruton, Roger, zhu; Wang Wanqiang, yi. *Bao shou zhu yi (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 Taipei: Li xu wen hua shi ye you xian gong si, 2006.
3. 朱熹，《四書集注》，臺北：學海書局，1982。
Zhu, xi. *Si shu ji zhu*, Taipei: Xue hai shu ju, 1982.
4.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臺北，學生書局，1959。
Mou, Zongsan. *Dao de de li xiang zhu yi*, Taipei: Xue sheng shu ju, 1959.
5. 李恩涵，〈清季同光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比較〉，《思與言》，第5卷第1期(臺北，1967)，頁13-23。
Li, En-han. "Qing ji tong guang zi qiang yun dong yu ri ben ming zhi wei xin yun dong de bi jiao," *Si yu yan*, 5:1(Taipei, 1967), 13-23.
6. 李恩涵，〈論清季自強運動的失敗與清廷中心領導層的關係〉，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Li, En-han. "Lun qing ji zi qiang yun dong de shi bai yu qing ting zhong xin ling dao ceng de guan xi," in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bian, *Qing ji zi qiang yun dong yan tao hui lun wen ji*,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84.
7. 李細珠，〈倭仁與道咸同時期的理學〉，收入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Li, Xizhu. "Wo-ren yu dao xian tong shi qi de li xue," in Zheng Dahua, Zou Xiaozhan, zhu bian, *Si xiang jia yu jin dai Zhongguo si xiang*, Beijing: She hui ke xue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5.
8.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57。

- Li, Jiannong. *Zhongguo jin bai nian zheng zhi shi*, Taipei: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57.
9. 李鴻章, 《李文忠公全集》, 臺北: 交海出版社, 1962。
- Li, Hongzhang. *Li Wenzhong gong quan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62.
10. 殷海光, 《中國文化的展望》, 臺北: 活泉出版社, 1981。
- Yin, Haiguang. *Zhongguo wen hua de zhan wang*, Taipei: Huo quan chu ban she, 1981.
11. 梁啟超, 《飲冰室合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89。
- Liang, Qichao. *Yin bing shi he j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9.
12. 陸寶千, 〈倭仁論〉,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2期(臺北, 1971), 頁257-270。
- Lu, Baoqian. "Wo-ren lun,"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2 (Taipei, 1971), 257-270.
13. 張灝, 〈宋明以來儒家經世思想試釋〉, 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4。
- Zhang, Hao. "Song ming yi lai ru jia jing shi si xiang shi shi," in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bian, Jin shi Zhongguo jing shi si xiang yan tao hui lun wen ji*,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1984.
14. 曾國藩, 《曾文正公全集》, 臺北: 交海出版社, 1974。
- Zeng, Guofan. *Zeng Wenzheng gong quan ji*,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74.
15. 費正清編, 張玉法主譯, 《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冊10, 臺北: 南天書局, 1987。
- Fairbank, John K., bian, Zhang Yufa, zhu yi. *Jianqiao Zhongguo shi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0*, Taipei: Nan tian shu ju, 1987.
16. 趙爾巽等撰,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校註, 《清史稿校註》, 臺北: 國史館, 1986-91。
- Zhao, Erxun, deng zhuan; Qing shi gao jiao zhu bian zuan xiao zu, jiao zhu. *Qing shi gao jiao zhu*, Taipei: Guo shi guan, 1986-91.
17. 薛化元, 《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 官定意識形態的西化理論》, 臺北: 稻鄉出版社, 1991。
- Xue, Huayuan. *Wan Qing "Zhong ti xi yong" si xiang lun (1861-1900): guan ding yi shi xing tai de xi hua li lun*, Taipei: Dao xiang chu ban she, 1991.
18. 寶璽等修,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 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62輯, 臺北: 交海出版社, 1971。
- Baoyun, deng xiu. *Tongzhi chao chou ban yi wu shi mo*, in *Jin dai Zhongguo shi liao cong kan*, no. 62, Taipei: Wen hai chu ban she, 1971.

(二) 英文

1. Chan, Wing-tsit. "Moral and social programs: the *Great Learning*," in Wing-tsit Chan, comp.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2. Chang, Hao. "The anti-foreignist of Wo Jen, 1804-1871," *Papers on China*, 14 (1960), 1-29.
3. Chang, Hao. "The heritage of the ideal of *ching-shih*," in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Hummel, Arthur W. *Eminent Chinese of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5. Liu, Kwang-ching. "The Confucian as patriot and pragmatist: Li Hung-chang's formative years, 1823-1866,"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0 (1970), 5-45.
6. Schwartz, Benjamin I. "Notes on conservatism in general and in China in particular,"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7. Tu, Wei-ming.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hung-yung*,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6.
8. Wright, Mary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An Analysis of Some Conservative Ideas in the Debate on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School of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Late Ch'ing

Pan, Jen-tai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he reasons for the limited achievements of the late Ch'ing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are various. This study takes the debate 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posals of the movement as an example: the propos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chool of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t analyzes the thought and opinions of some of the main participant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debate, who were also key politicians in the period. My study highlights the conservative elements in the thought of these participants, which in my view are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the Movement. The two main conservative ideas identified are moral ideal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se two ideas certainly are not new with regar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 therefore do not intend to do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m. However, it is worthwhile to explore how they embodied and functioned in the debate. To be more specific, in this study I will explain how these two ideas were usually presented as theories regarding morality as essentially important in politics ('te chih shuo'), as a metaphor of root-branch polarity ('pen mo shuo'), as a belief in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Chinese methods and Western methods, and as a worry and call for alertness about Westernization. They functioned to support the theories behind the opinions of the opponen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of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and, more importantly, we will study how they reflected on the minds of the promoters and functioned as psychological obstacles for them to straightforwardly promote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Keywords: 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 the school of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moral idealism, a theory which regarding moral as essentially important in politics ('te chih shuo'), the metaphor of root-branch polarity ('pen mo shuo'), cultural nationalism, the belief in the equivalence between Chinese methods and Western methods, the worry and alert about Westernization, Wo Jen, Chang Sheng-tsao, Yang T'ing-hsi, I Hsin, Li Hung-chang, Tseng Kuo-fan

